

《诗经》中的感伤叙事

李莘^{1*}

(¹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诗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典籍, 对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影响着后世诗歌创作主题的形成。《国风》多抒写民间婚恋、怨刺与征役之痛, 《雅》诗则集中表达贵族的忧生之嗟与政治讽谏; 在艺术上, 重章叠句的结构与时空意象的运用, 共同强化了感伤情感的抒发。这一传统为汉乐府的写实精神与《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所继承, 并深刻影响了后世诗歌的发展路径。同时辨析《国风》与《雅》诗在感伤内容上的阶层差异、剖析其重章叠句与时空建构等核心叙事手法, 并以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为例, 阐释此传统在后世文学中的承袭与演变。揭示《诗经》如何奠定中国文学叙情相生的抒情范式。

关键词: 诗经; 感伤叙事; 《古诗十九首》; 汉乐府

DOI: <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2.865>

The Sentimental Narratives in the Book of Songs

Li Shen^{1*}

(¹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as the oldest classical anthology of poetry in China,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matic concerns in later poetic creations through its authentic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ies. The Airs of the States often depict the sorrows of folk romance, grievances, and the hardships of conscription, while the Odes focus on expressing the aristocratic laments over existential anxieties and political admonitions. Artistically, the use of repetitive structures and the imagery of time and space collectively intensify the expression of melancholic emotions. This tradition was inherited by the realistic spirit of the Han-dynasty Music Bureau poetry (*Yuefu*) and the existent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Nineteen Old Poems*, profoundly shap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Simultaneously, it is essential to analyze the class-based distinctions in the melancholic themes between the Airs of the States and the Odes, examine core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repet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magery, and illustrate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this tradition through examples from Han-dynasty *Yuefu* poetry and the *Nineteen Old Poems*. This exploration reveals how the Book of Songs established the lyrical paradigm in Chinese literature, where narrative and emotion are intertwined.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Melancholic Narrative; *Nineteen Old Poems*; *Han Yuefu Poetry*

作者简介: 李莘 (1999-), 女, 黑龙江哈尔滨, 硕士, 研究方向: 先秦文学

通讯作者: 李莘, 通讯邮箱: 872430451@qq.com

www.shiharr.com

- 8 -

引言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发轫之一，风格影响着后世诗歌的创作，内容与所表达的思想亦成为后世创作的土壤。《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创作风格，无一不对中国文学模式的生成起到了奠基性的意义。其中，《诗经》中的叙事性与多元情感（包括感伤、欢愉、怨刺等）尤其感伤情绪的相交相融，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颇深。

1 《诗经》感伤叙事的多样表达

作为现实主义诗歌源头，《诗经》一直因其内容主题上的真实与情感表达上的内敛著称，圣人对其评价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对这种风格的典型归纳。与此同时，《诗经》中的叙事因素并非与抒情独立存在、相悖而行，相反，从《诗经》这一源头开始，叙事与抒情这两大手法就一直相伴相生，混溶一体。“感伤”一词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是人类一种低沉的生命情绪，是指人因某种感触而产生的悲伤之情。^[1]《诗经》中“感伤”一词始见于《陈风·泽陂》序：“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有关“感伤诗”的研究由来已久，肖建华就曾给《诗经》中的感伤诗做出分类：“《诗经》中的感伤诗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爱情婚姻的感伤；第二是骨肉之情感伤；第三是思乡感伤；第四是个体价值感伤；第五是忧国忧民感伤。”^[2]从中可以看出，《诗经》中的感伤诗往往指以忧伤、哀怨为核心的主题内容，而“感伤叙事”则聚焦于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呈现和深化这种情感的艺术手法。因为“叙事”在宋的定义中，更趋向于一种方式。《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一节中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唐代贾公彦疏：“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错谬。”^[3]可以说，“感伤诗”是具体的一类诗作，而“感伤叙事”则偏重于诗歌所用的手法，这种叙事多存在于“感伤诗”，又不仅仅存在于“感伤诗”。正因此，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叙事元素与抒情元素相辅相成，共同在不同主题下发挥作用。从创作主体与内容视角来看，《国风》与《大雅》《小雅》的感伤叙事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

1.1 《国风》：生活事件之上的直白感伤

《国风》是先秦各个诸侯国的民歌，内容所反应的是当时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风貌，是个视角大多聚焦于人民百姓，由百姓之口写当世之事，“……，按我们的理解做了大致归类，即婚恋家庭、美刺统治者、战争徭役、农事生产。”^[4]而这些诗歌根据国家地域的不同而反应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国风》的分析，可以梳理出当时不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乃至各方面的差异，从而更清晰地分析其中的情感。也能从内容中比较探寻，异中求同，分析出当时人民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思想感情。

各个国家的民歌发自人民之口，叙述人民自身生活，记录人们的生命体验，自然带着人民自己的生活体悟。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娱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5]。就是很正常的情况了。虽然感伤情绪并非《国风》唯一基调，其中亦不乏欢愉、颂美之作，但的确可以看出，感伤情绪是《国风》诗歌中较为突出的一种情感类型。而根据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大概可以把《国风》中的感伤诗分为大概三个主题：男女之情、怨刺和感时伤事。而其中，表达男女之情的诗歌又可以大致分为思慕如《关雎》、恋情和婚姻如《氓》等多种情况。而在“风”的怨刺诗中，所指对象一般地位较高，主题上则比较多样化：有针对欺压的愤懑不平之语、也有对上位者生活习惯淫乱的讽刺批评。至于感时伤事这一部分，主力军则是游子思妇，游子的“忧生之嗟”、思妇的愁绪牵挂，和对于离别的苦痛共同组成了这一部分感伤的内容。《国风》生发于人民百姓之口，从出现于世间则自然带有民间的特点，《国风》中的感伤表达同样带着鲜明的民间印记。

《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目以记录生活的目的和直白叙事的风格为主，在这种前提下，诗作中

所流露出的感伤自然更偏向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而既然如此，《国风》的感伤也就自然带有了独属于《国风》的特点：平白的语言、鲜明的情感和悲凉的氛围。在《国风》表达男女之情主题的诗歌中，最容易体现感伤的部分大多是和婚姻有关的诗歌，这种诗歌多以女子视角去抒发情感，比如《卫风·氓》就对这种感伤情绪的描写方式有所体现。前两段内容平实叙述相恋过程，而第三段笔墨一转，女之耽兮，不可说也^[6]。充满女子被抛弃后心中的不平愤懑，控诉之语字字血泪，感伤情绪溢于言表。而《国风》中的怨刺诗类别则要更广泛一点，比如目的集中在批判剥削的《魏风·硕鼠》《唐风·鸛羽》，讽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邶风·新台》与《齐风·南山》，这两首诗情节甚至十分类似，都是对统治者乱伦的讽刺批判。此外，《鄘风·相鼠》直斥肉食者鄙陋，悲愤的控诉和辛辣的讽刺直白地显示出普通百姓的愤懑。而感时伤事的主力军是游子思妇。《王风·君子于役》是思妇诗的代表，“曷至哉”“曷其有佸”两句总括出妇人对外出游子的惦念。《国风》中以游子为主体的宦游诗更不在少数。《桧风·匪风》《魏风·陟岵》《卫风·河广》都表现出类似的情感。另外，在涉及到“忧生之嗟”这一情绪外，还有再附加感慨生存不易的部分，比如：《召南·小星》《邶风·北门》《王风·兔爰》《秦风·权舆》《桧风·隰有苕楚》。另有伤感生命脆弱的：《唐风·蟋蟀》《秦风·车邻》《曹风·蜉蝣》。在这些篇目中，《蜉蝣》一篇尤为能看出对时间易逝的感伤。而《邶风·燕燕》则描写了离别时的伤感。综上，可以看出《国风》所涉感伤情绪主题之全、所叙述范围之广，《国风》中人民的感伤表达，几乎可以覆盖人民生活各个方面。

1.2 《雅》诗：政治抒怀之中的含蓄感伤

与《国风》不同，《大雅》《小雅》的叙事主要集中于周朝朝堂，而这两部分互相之间比较起来看，《大雅》的内容更为庄严。和《国风》相比，《大雅》和《小雅》表达情感的部分同样强烈，只是主题相对有所不同：《大雅》及《小雅》中几乎没有婚恋相关的内容，而对于统治阶层和君王的批判则更加犀利，此外，在个体的生命遭遇上，《小雅》的感伤也同样伤怀。

由于作诗之人身份地位和所处阶级不同，诗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和叙述自然会有差别。因此，在《大雅》与《小雅》中，哪怕是同样感慨生命艰难的部分，和《国风》中的类似主题的诗篇依然有着微妙的差别。比如《小雅》中的《采薇》，作者作为戍边的军人，身份在单纯的游子之外就加上了明确的职位，而诗篇中感伤的主题，就更多集中在了戍边和思乡，“曰归曰归”的重复把这种悲苦重重渲染。此外，《大雅》中的《抑》《瞻印》，与《小雅》中的《四月》《北山》《苕之华》等，都是能体会到当时人们对人生艰难叹息的诗篇。另有从时间流逝的角度抒发感慨的作品，如《小雅·頍弁》中的“死丧无日，无几相见”^[7]。就明确体现出对生命无常、岁月无情的慨叹。

《大雅》《小雅》中还存在着数量巨大的怨刺诗。这一部分依旧因为作诗之人身份的不同而与《国风》的怨刺部分有着不小的差别。比如《小雅》《大雅》中对于君王的批判，抒发批判的视角就基本集中在了大夫或者诸侯王身上，这时，这些“上层阶级”所怨刺的内容和表达的语言，对比起《国风》也就更加详细和正式。比如从《谷风之什》开始的一众刺幽王的篇章，主题详细周密，从祭祀到用人制度无不涉猎，视角更是多样，用大夫到诸侯国君等不同层次的身份层层递进叠加，无一不在深刻地批判着幽王的昏庸。同时，还存在有为数不少的刺厉王的篇章，如凡伯刺厉王的《板》，伤周室大坏的《荡》，这些篇章在对幽王的批判上更进了一步，除了对昏庸君主的批判之外，更有了作者对国家未来的忧伤和对自己无法作为的痛苦，这些伤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出了“雅”沉重又感伤的情感基调。

2 《诗经》感伤叙事的艺术手法

《诗经》中的感伤并非直白呼告，而是通过成熟的叙事技巧得以呈现，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其精妙的语言结构与时空叙事手段之上。

2.1 重章复沓：感伤的节奏化递进

一般认为：《诗经》中重章结构往往会影叙事诗的判定，发展应体现事情发展的时间、地点等要素的变化，若仅有单纯的地点或时间变化，借由重章叠调与比兴手法而歌的诗作则不归为叙事诗^[8]。《诗经》中的语言结构向来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章叠句、回环往复的句式可以说是《诗经》语言最具有特色的部分，而这两点在构成了语言音韵美的同时，也起到了加强语气、强调重点的作用。重章叠句这一《诗经》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结构，在叙事的递进中，极大强化了感伤叙事中情感的叠加。《诗经》中常重复的句子作为起兴，但这种重复往往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在反复中做简单的字词的变化，从这种细微变化中展现出事物的发展，模拟出事态的递进，并滞留情感，将情绪层层推进。比如《小雅·采薇》中，重章叠句的运用就表现出了事物的发展和情感的变化。“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薇草逐渐生长，主人公的情绪也随之而增强，薇草从“作”到“柔”再到“刚”，戍役的漫长也终于确定了归家的无望。《王风·黍离》中也存在“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穗、实”的复沓和诗人在三章中反复吟唱的“中心摇摇、如醉、如噎”，在稷苗成长、时序变迁的重复中，将亡国之痛与物是人非的悲凉感累积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感伤的情绪在语句的迭代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情感表达透彻有力。这种结构还有助于在有限的篇幅中，以下篇叙事补足上一篇未尽之事。叙事完整的同时，情感表达也更加的浑融完满。

《诗经》作为集体创作的诗歌源头，如第一章节中所述，不同部分中存在着集体身份阶级的不同，诗歌内容更会因为这种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特色，而这一特点在语言上表现地格外明显。作为四言诗的鼻祖，《诗经》全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目都用四言，少有几篇三言五言。但即使字数相同格式相似，甚至连表达的主题都带着隐含的同一性，但这种不同也已然会让诗歌语言在不同篇章中体现出不同的效果。比如“怨刺”主题的诗歌。《诗经》中存在着数量不少的怨刺诗，“变风变雅”就是对这种类型的统称。但《国风》出自各国百姓之口，语言就相对平实直白，比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直白控诉，就和《大雅·民劳》中出自召穆公之口的“民亦劳止，汙可小康”的委婉讽刺就明显不同。一个用生动的比喻讽刺剥削，一个以委婉的语言上刺厉王，不同的语言风格，传达出了同样强烈的感伤情绪。

2.2 时空建构：感伤的意境化生成

时间的流逝本就是容易引起人类感伤的因素，而这一点在《诗经》的“感伤叙事”中也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对时间有了认识，恰恰正是因为这种认识，才会在《诗经》中产生因为时间流逝而感伤的情况。《诗经》中的时间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年月日等历法来表示时间的“显性时间概念”；另一类是星象、物候及空间转换等隐性的方式表达，我们称之为“隐性时间概念”^[9]。《诗经》因为时间而引起的感伤甚至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几个分类，有单纯因为时间流逝而引起的感伤，比如《标有梅》就显示出了对于青春逝去、而才华无法被发现而引发的焦虑。《蟋蟀》《蟋蟀》则更侧重于感叹生命的短暂易逝，并且还在此之外还多了一点感时惜时、及时行乐的应对态度，《唐风·蟋蟀》中“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暮）”，通过秋虫入室这一自然现象，瞬间将人抛入岁末的时间节点，由此生发出“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的生命紧迫与感伤。当然，这种算不上积极的态度与当时人们看不见未来和希望的生存环境同样息息相关。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之外，时间的流动性还在表达对于离别伤感的诗作里十分常见。

而除了单纯的应用时间元素之外，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也在《诗经》的感伤叙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诗经》中对空间的描写大多跟随在事件的叙述中，空间往往是一切叙述发生的基础，而时间则几乎很难脱离空间单独存在。空间独立发挥作用比如农事诗或者祭祀诗中对具体场景的描写。比如《秦风·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开篇，用秋日清晨的芦苇荡构建了一个

辽阔、朦胧又带寒意的物理空间，这个空间本身就是其求而不得的感伤情绪的外化与象征。而空间和时间结合、共同构成时空的变化情况也同样存在，比如《七月》中的“蟋蟀”：“在野”“在宇”“在户”到“入我床下”，就是在不同的空间变化中，展现出了时间的推移，时空共同构造出事件的递进感。另外，时空还共同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表达情感的要素：意境。感情往往存在于意境之中，尤其在游子思妇一类诗歌当中应用尤其广泛。在这里，时间的变化通常和空间中的某个意象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勾起主人公感伤情绪的意境，比如《君子于役》中的日和鸡的相互映照，“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就是将一个日常又循环的黄昏场景（时间）与家园的、期盼的视野（空间）相结合，为思妇的感伤提供了一个每天都在重复触发的、极具普遍性的情境，从而使其情感超越了个人，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共同的情感，由此具备了打动千古的力量。《小星》中也以星宿作为时间空间的锚点，共同表现出小吏的辛勤与劳苦。《诗经》中这种多种表达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手法，也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3 《诗经》中的感伤叙事对后世影响

《诗经》作为行情言志文学的开端，全面地反映了周民的生活及其情感，也营造出一种典型的情境“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这积聚了民族共感的声音，正是荣格所说的“原型情境”。也传达了人类共同的心声。^[9]《诗经》所开创的感伤叙事范式为后世文学提供了鲜明的抒情与叙事所结合的方法，从一看便知道有直接承继关系的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到联系相对隐晦而并不一目了然的《楚辞》与更为后世的诗歌创作，都与《诗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经》在起到奠基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情感表达、叙事性等多个方面对文学的行程和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3.1 对汉乐府的影响

作为和两汉辞赋共同发展起来的诗歌，汉乐府直白朴素的风格和赋体的铺张扬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乐府的叙事性和语言风格，无不显示着《诗经》对它的影响。虽然汉乐府有部分诗作已经发展到了五言的结构，但依旧存在四言诗，更有在结构上直接模仿诗经的作品，如韦孟《讽谏诗》。这一部分作品主要出自官僚文人之手，对《诗经》更多是语言结构上的模仿。而《诗经》对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更加体现在内容上。在汉代独特的社会背景下，汉乐府民歌对于当时人民痛苦的揭露与《诗经》一脉相承，甚至语言更加犀利，血泪更加深沉，在继承《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叙事精神的同时，汉乐府在“事”的呈现上更为完整，五言以及更多的字数和篇章让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更加完善，叙事技法也更加成熟。汉乐府善用特点人物视角强化感伤，《妇病行》就是这一类诗歌的代表，“我欲不伤悲不能已。”通过丈夫亲眼目睹妻子病亡又无力抚养幼子等叙述的全过程，现场感与无力感使得感伤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手法使得诗歌比起《诗经》更为刺骨。人民困顿生活的揭露与劝百讽一、言辞华丽的描写是汉乐府民歌在内容上与汉赋的功利性目的形成的鲜明对比。此外，在叙事技法上，汉乐府民歌也体现出和《诗经》的相似性。语言简单，一篇所叙一事，另有通过时空节叙的变化抒发情感都能体现出这种相似性。《诗经》的感伤多基于一个典型场景或片段（如《君子于役》的日暮望归），而汉乐府则常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事件。如《十五从军征》，通过老兵归家后的“采葵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等一系列动作细节，以行为叙事代替直抒胸臆，将物是人非的感伤推向高潮，这是对《诗经》片段化叙事的扩容此外，汉乐府民歌中，还存在着与诗歌类似的起兴手法，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艳歌行》的“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都能看出这种承继关系。

3.2 对《古诗十九首》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与《诗经》之间的联系更多体现在感时伤逝的内容和以此产生的感伤情绪上，

而在这些内容中,又以游子思妇主题为巨。与《诗经》相比,《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已经从相对单纯的男女相思或简单的生命体验发展到了更成熟的境地,比如其中以思妇为主题的诗,就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生命意识。从《诗经》中的“为具体事情而感伤”发展到了“为人生感伤”。《行行重行行》中“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明确表达出了这种对于生命流逝、青春不再的痛楚,除了单纯的“思君”以外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感伤。将简单的思妇升华为生命在白白等待中消逝的悲哀。直指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等终极命题。除此之外,思妇诗的不同与时代的不同导致的女性地位变化也有关系。《诗经》时代稍早,收录的内容多为民间口口相传。而当时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此时虽然已经产生了封建礼教的萌芽,但萌芽期的“规矩”并不完善,对女性的要求也远没有礼教成型后那般刻板,而《古诗十九首》则已经完全进入了封建时期,女性地位变化导致女性视角的变化,自然会使得以女性视角创作的诗歌随之而不同。也不怪赵敏俐先生认为:它的内蕴,远远超出了男女相思之外,也使它与《诗经》中那些问题之作有了明显的时代意识差别和抒情主体的差别。它既是男女之情的表露,更是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既表现了汉人对生命问题的时代思考,又突出了汉代文人的世俗情怀^[10]。

《古诗十九首》极大吸收了《诗经》的时空意象手法,但将其从叙事的背景推向了抒情的前台,并赋予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完成了感伤叙事从“向外叙事”到“向内抒怀”的关键转变。《诗经》中的时空意象多与具体事件绑定(如《采薇》的薇菜,《七月》的蟋蟀),或者借助星宿节气等来表达时间观念,而《古诗十九首》则在此基础上把时间和情绪直接糅合,表情达意更加完善,在借助物象表情上更进了一步。《古诗十九首》中将时空提纯为高度象征性的抒情符号,如《明月皎夜光》中的“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夜意象不再关联农事或征役,而是直接指向“时光流逝、友情不固”的抽象生命体验,叙事让位于纯粹的意境营造。而以游子为主题的诗歌,则更多表现出“忧生之嗟”。从内容上来看,《诗经》的“忧生之嗟”多为感慨生存困苦和生命艰难,而《古诗十九首》则更侧重于对时间流逝、生命短暂的叹惋,这与作者的身份不同和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都有关系。此外,《诗经》中多对具体事情而发出感伤,而《古诗十九首》感伤的对象则相对泛泛,少有因为一时一事而抒发感慨。

3.3 对后世诗歌的泛化影响

《诗经》自“出生”起就展现出了叙事与抒情并行发展的趋势,这种互相融合又并行不悖的模式给之后的文学创作树立了模范。《诗经》对于现实的关注和融情于事的手法,自始至终渗透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中。唐代杜甫“诗史”笔法中的家国感伤就能看出这种影响。杜甫将《国风》的个人叙事与《雅》诗的政治关怀熔于一炉,创造出“以个人命运叙事写家国感伤”的典范。《春望》中,“国破”与“家亡”通过“花溅泪”“鸟惊心”的意象融为一体,将宏大历史悲剧压缩在诗人个人的感官与叙事中,感伤因而变得无比沉重具体。元白对现实关注的“新乐府运动”更是对《诗经》“讽谏叙事”传统的回归与强化。他明确提出“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卖炭翁》通篇白描叙事,仅在结尾以“系向牛头充炭直”一事点破悲愤,将感伤深藏于冷静的、批判性的叙事背后,继承了《雅》诗含蓄而有力的叙事策略。《诗经》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了大批包括屈原在内的爱国主义诗人。《诗经》在文学出现之初就为其后的文学创设出了一个融合了抒情和叙述的表达情景,为其后的感伤心理,预设出了可追溯的源头和根脉。

4 总结

《诗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叙事诗集,内容海纳百川,包容广阔。其创作者上至诸侯国君下至平民百姓,三百零五篇诗歌在不同阶级不同层面的表达中如实拼凑出复古的生活画卷,在以诗歌叙事的同事,情感也被真实而显露的传递。《诗经》的语言结构和感伤叙事的主题直接影响到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对现实的关注和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感伤叙事也为之后的文学创

作奠定了基础。本文聚焦于《诗经》中的感伤叙事，旨在探讨其艺术特征与影响，《诗经》的情感世界远不止于此，尚有颂美、欢愉、讽谏等多种色调，但感伤仍然是其中浓墨重彩一笔。

参考文献：

- [1] 徐国荣. 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
- [2] 肖建华. “诗经”感伤诗的美学价值[J]. 江汉论坛, 1993(3): 68.
- [3]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0+13.
- [4] 朱东润. 诗三百篇探故[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5] 董乃斌. 《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J]. 东北师大学报, 2024(2): 2.
- [6] 李学勤. 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董永静. 《诗经》感伤母体研究[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12.
- [8] 李亚兰. 《诗经》中的叙事诗与叙事模式研究[J]. 名作欣赏, 2024(18): 11
- [9] 马庆洲. 物换星移: 《诗经》时间概念考释[J]. 清华大学学报, 2010(3): 73.
- [10] 赵敏俐. 两汉诗歌研究[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1993.